

# 谈史学遗产

## 是一种有意义的工作

建国以来，医药学遗产和戏曲遗产的整理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一个是蓬蓬勃勃，一个是万紫千红。历史遗产的其他方面，如数学、天文历法、农学、化学、建筑、机械、音乐、舞蹈、雕塑、绘画、文学、哲学等等的整理工作，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绩。祖国史学有长期的历史，有浩瀚的典籍，它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是丰富的。但我们史学工作者注意一般的历史遗产比较多，注意史学遗产还很不够。这篇小文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促请同志们多注意一下。

我认为，在努力开拓史学工作的新园地、提高不断耕耘的质量的同时，适当地分出一些力量来研究史学遗产，对于发展我们的新史学是有意义的。我想，这至少可以得到下列的几种好处。

第一，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更具体更深刻地理解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现实斗争中的战斗作用。

自殷商“有册有典”以后，国史的编修大权主要是掌握在奴隶主国家和封建主国家的手里。在封建时代里，官史没有不咒骂农民起义的，没有不把对农民的镇压写成神圣的“正义”行动，而又往往把官兵对老百姓的残杀掳掠写在起义农民的账上。改朝换代了，回护本朝的短和夸大前朝的罪恶和错误，这就成了新修史书的一个政治任务。如果在封建割据的时期，不同割据集团的史书就会互相对骂起来。

也有进步的或有进步倾向的史学家写出了触犯统治集团利益的东西，他这个人或他的这部书就要倒霉了。司马迁揭了封建统治者的疮疤，他的《史记》就不如班固的《汉书》在当时易于流传。东晋的孙盛写了一部《晋阳秋》，揭了桓温的底，触怒了这个当权的人物，他不得不另抄一个副本寄存辽东以防书稿的毁灭。清初的庄廷铨案是一个有名的历史书狱。只因触犯了清廷，庄氏的墓被发掘，他的尸骨被烧成灰，他的父亲、兄弟和侄儿、编书、刻书、卖书和其他被牵连的，共有七十多个人被砍了头。

一切历史著作都不能不受作者历史观的支配。不同的历史观，归根到底，总可以从不同的阶级利益上得到解释。但历史观在反映阶级利益的时候，往往是错综曲折，不一定明显确切。再加上史学传统的继承性，就使我们对于史学遗产进行阶级分析的工作更加复杂化了。但也正因为这样，研究史学遗产才更有意

义，才更能帮助我们理解史学在现实斗争中的具体特点。

第二，研究史学遗产可以逐步摸索出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

从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不同时期的历史著作总有它的不同的特点。先秦的历史著录，如甲骨卜辞、钟鼎文字、《尚书》、《春秋》、《竹书纪年》、《世本》等，表达的形式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只纪王公的活动，不是孤立的单篇，就是连续的片断。魏晋南北朝时期，纪传体的撰述较多，后汉史有十一家，晋史有十二家。而名人传记可考者近二百家，姓氏书有七八十种。唐中叶以后，大部头的通史相继出现。清代是考据多，地理书多，注释辑补改作旧史的书多。为什么在不同时期有这样不同的特点，这一定有它们的规律。

中国史学史上还出现这样一个传统：在中国历史遇到一定显著变化以后，总有带总结性的历史名著出现。春秋战国之际，《春秋》这部书写成了，总结了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汉在武帝时完成了史无前例的统一，司马迁写出了一百三十卷的《史记》，总结了自传说中的黄帝以至武帝时的历史。唐代中叶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有了较多变动的时期，刘知几写了《史通》，总结了前人编写历史的经验，而杜佑写了《通典》，总结了唐中叶以前的典章制度。北宋结

束了五代的纷争，司马光主编了到五代为止的《资治通鉴》。宋元之际和明清之际都是中国政治史上很大的变局，马端临编撰了《文献通考》，王夫之写了《读通鉴论》、《宋论》，顾炎武编撰了《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黄宗羲写了《明夷待访录》。这样的传统也不能单从形式上来考察，它也必然有跟中国史学发展规律相结合的具体规律。

中国史学的发展也是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从最简单的关系到比较复杂的关系。不同时期的史学一方面受所处时期历史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也有接受前代传统的相对独立性。同时，中国史学在悠久时期里又是独立状态中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规律也必然有自己的民族特点。研究史学遗产，摸索出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这是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有很大的理论意义。

第三，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把历史上提出来的一些史学问题作为当前历史研究的资料，丰富我们研究的内容。我们可以专门研究一个史学家或一部史学著作所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把不同的史学家、不同的史学著作所提出来的同一问题和相关问题进行综合的研究。如果在比较广泛的范围内，把已经提出的问题和有关的不同论点集中起来，排排队，可能对于我们有不少的启发。

例如《文献通考》这部书，一向被认为是一部排

比材料的书，不能跟杜佑《通典》之“剪裁镕铸、成一家言”者相提并论。不同意这种说法的，也只不过认为《通考》的资料丰富，便于撷取。其实《通考》更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它提出来许多问题，又提出来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其中有些是前人提出过的，有些是马端临新提出来的，两者汇合在一起，就有了很多的东西。拿开卷的二十七卷来说，都是关于食货的文献，其中分了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籩、土贡、国用等八门，每门里面又有子目。马端临对于这八门，都分别提出了一个因革变化的轮廓，对于有关的某些文献也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和看法。在科学地分析问题这一点上，马端临所能掌握的条件是无法跟我们这一时代的史学工作者相比拟的。但对于食货的材料提出这样多的方面并且都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这其中还是有不少地方可以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又如《史通》和《文史通义》，都提出了不少历史编纂学上的问题。《史通》的《序例》、《断限》、《采撰》、《补注》等篇，《文史通义》的《史注》、《文理》、《释通》、《申郑》、《答问》等篇 其中有好多话还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除了从遗产内丰富我们以外，我们还可以在遗产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地促使自己的头脑清醒。思想意识的影响往往是长期的，自己受到了这种影响并不一定能觉察。在研究遗产的时候，就可能发现自己的观

点上笼罩着旧有思想的阴影，它可是资产阶级的，甚至是封建的。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古旧的遗产会成为一面有用的镜子。

对上面说的这三条，无论做好哪一条，都需要创造性的劳动，都可能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锻炼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战斗力量，也都可能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要研究史学遗产，既不同于那些要把遗产一脚踢开的割断历史的简单的想法，也跟那些颂古非今的死抱着遗产不放的国粹主义者毫无共同的地方。我们主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改造我们的遗产，使它为社会主义史学服务。我们要继承优良传统，同时更要敢于打破传统，创造出宏大深湛的新的史学规模。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这段话是针对

着文学艺术遗产说的。从对待遗产应有的正确态度来说，在文学艺术和史学之间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我们对于毛主席的这段论述，应该认真地学习、体会。

## 精华和糟粕

史学遗产有精华，有糟粕。从思想内容上说，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是精华，封建性的东西是糟粕，这就要像毛主席所指出的“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新民主主义论》），在表达形式和其他方面，史学遗产中也有优良传统和非优良传统的区别。对于这些优良传统，也要像对待过去文艺形式一样，“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思想内容上，中国史学遗产中是贯串着拥护封建专制主义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的。尽管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史学家并不能全部反对封建主义，也不一定全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但专就反对专制主义或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某些方面来说，这跟拥护封建专制主义就有进步和落后、反动的区别，也就有精华和糟粕的区别。

司马迁著《史记》，是善于揭露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黑暗的。他写了《酷吏列传》，把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时期酷吏代表人物集中在一起，就把汉

家盛世在专制淫威下的残酷面貌揭露出来了。他写了《叔孙通传》，把跟随叔孙通的儒生们，在定朝仪前后思想变化的丑态刻画出来，最后轻轻点了一句，说叔孙通因制朝仪“卒为汉家儒宗”，这就把汉代儒家的政治面貌揭露出来了。他又写了《游侠列传》和《货殖列传》，去讽刺当时之以权力财货代替是非善恶的标准，深深愤慨于“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班固作为在史书体制上的司马迁的继承人，却恰好反对司马迁反封建专制主义的观点。他在《汉书》里，批评司马迁是“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范晔著《后汉书》，又不同于班固的观点。他的《党锢列传》，有类于司马迁的《游侠列传》。他为王充、王符、仲长统作合传，恰好这三个人都是唯物论者，或能“正时俗嫌疑”，或“耿介不同于俗”，或能昌言“时敝”，用班固的话说，都是在不同情况下“是非颇谬于圣人”的。他评骘司马迁和班固说：“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这并不是对两人文章特点的评论，而是对两人史学高下的评论。虽寥寥两语，却自有千秋。他在班彪、班固父子传后指出：“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这实际上就是反对班固站在专制主义的立场上对于游侠的看法。从司马迁到

班固，又从班固到范曄，反对和拥护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是在一个回合又一个回合地进行的。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目的在于为封建统治集团提供进行统治的历史经验。朱熹用《通鉴》的材料，节缩成《通鉴纲目》，不只要提供统治经验，并且要通过史书去宣扬封建专制主义。这书讲究“因年以著统”，说：“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这个“统”，就是所谓“正统”。《通鉴纲目》强调正统，就是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专拥护某一皇朝的统治，而对于反对这种统治的政治力量一概称作“僭伪”。这书的凡例，有系统、岁年、名位、即位、改元、尊立、崩葬、篡贼、行幸、恩泽等等，这也都跟正统观点相一致，都是为宣扬专制主义服务的。在元明清三代，这书实际上成为封建统治集团最赏识和推崇的史书。有人为这书作续补，有人为这书作《发明》、《书法》、《集览》、《考证》等解说性质的书。康熙皇帝又对这书作了“御批”，企图通过“御批”的形式扩大它的影响。

在《通鉴纲目》流行的时期，史学思想的领域里不断发出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抗议。晚明的李贽著《藏书》，这是一部有丰富的战斗性格的史书。他自称“读史时，真如与百千万人作对敌，一经对垒，自然献俘授首，殊有绝致，未易告语。”他不是以直接反对专制主义出现，而是以反对封建主义教条、反对封建传统的成见出现的。清初，在先进思想家、史学家

的社会历史思想中，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表现得更为集中，也更为普遍一些。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尖锐地抨击封建皇帝“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取少数人的产业和淫乐。唐甄著《潜书》，斥言“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一人而夺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把反封建专制的意思说得婉转些，也明白指出专制主义是“为天子防其篡夺”。《黄书》里更谴责某些皇帝平日作福作威、鱼肉人民，但不能在必要的时候搞好国防，连跟玄驹保卫自己的巢穴都不能比。顾炎武的《日知录》，把改朝换代叫作“亡国”，民族屈辱叫作“亡天下”，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就连专制主义的基本教条所谓“君臣之义”，都抛开了。

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拥护封建专制主义是史学遗产中精华和糟粕相区别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此外，在历史思想上还表现为：（一）人定胜天说跟命定说间的斗争。如班固宣扬董仲舒、刘向刘歆父子以阴阳五行解释历史的神秘的命定论，在《汉书》中写出《五行志》的专篇。而刘知几著《史通》，主张“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他写出了《汉书五行志错误》和《五行志杂驳》两篇，用文献学的方法指出《五行志》对灾祥征应的牵

强附会，指出《五行志》所持的论点跟所用以说明的史事间存在着互相矛盾。揭露了命定论的虚妄，实际上也就是揭穿了封建皇权的神秘的外衣。（二）时势创造历史说跟英雄创造历史说的斗争。如《汉书》在《地理志》中说黄帝画野分州，建立万国，而秦“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子遗”。这是把封建诸侯和设立郡县这样的大事，都取决于英雄人物（包含了圣王和暴君）的主观愿望。而朱敬则的《五等论》、杜佑的《通典》（卷三十一）、柳宗元的《封建论》以至顾炎武的《郡县论》，都是把封建诸侯和郡县设置归之于时势的可不可，而反对把它们说成是决定于英雄人物的愿不愿。英雄创造历史的说法有助于长封建统治者的威风，时势创造历史的观点有助于挫封建统治者的锐气。在时势创造说内，也有注意到政治上人心的向背的，也有根本看不到这一点的，虽都还说得很笼统，不能作具体的分析，已是历史上进步的东西了。（三）历史进化说跟是古非今和历史循环说的斗争。后两种观点是在正统史学家和一部分进步史学家中存在的。是古非今，一般尊崇二帝三王如圣如神，把他们的时代描绘成理想的黄金时代，这跟英雄创造历史、特别是圣王创造历史的观点相密切联系的。历史循环说，如三统说，五德终始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说，一治一乱说，若干年一大变、若干

年一小变说，有很多的说法，这跟命定说也是有密切联系的。主张历史进化说者，如刘知几《史通》，有《疑古》篇，揭破古史所颂扬二帝三王之虚妄，认为是把他们的丑恶美化了。杜佑在《通典》（卷三十一）里宣称“欲行古道，势莫能遵”，并说“汉隋大唐，海内统一，人户滋殖，三代莫侔”。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特别是在食货各门里，注意社会历史的变革，划出变革的阶段并举出划分阶段的标志。后来，王夫之和章学诚也都有历史进化的观点而各有其具体的内容。历史进化说跟时势创造历史说，有时是密切联系的，它们有寻找历史发展规律的要求，但还不能科学地发现规律。

在历史编纂学上，精华和糟粕的区别，有时表现在客观的求实态度跟主观主义的褒贬的作法间的斗争。正统史学家一贯主张，历史书要寓褒贬、别善恶，而把封建伦理的教条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刘知几在《史通》里，反复驳斥“褒贬任情”的作法。郑樵在《通志·总序》中，把这种托始于《春秋》的一字褒贬的作法，称作“欺人之学”，以与五行迷信之为“欺天之学”相对待。他说这无益于真实的历史工作，“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飧，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

刘知几有《直书》和《曲笔》的专篇，申论了直书的主张，揭露了曲笔的丑恶，并叙述了前者对后者

的斗争。曲笔有类于任情褒贬，而跟褒贬说还不相同。褒贬是在历史记载中强调封建伦理观点，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主观的抑扬，还不一定就要捏造历史。曲笔，有时也为了要符合一般伦理观念的要求，而更多的时候只是为了迎合当时权贵的好恶，于是不惜混淆是非，捏造历史。当然，直书是优良传统，曲笔只能说是丑恶了。

历史编纂史上还有一家独断之学跟史局监修间的斗争。这本质上是中世纪的私学跟官学、著述自由跟学术垄断之间的斗争。史局监修，也有可以肯定的一面。它跟一家独断之学的矛盾，是在权贵垄断史局、包而不办的情况下展开的。刘知几《忤时》一篇，论史局监修有五不可，就说的是这种情况下的矛盾。

以上所说精华、糟粕和它们之间的斗争，只是就我所想到的列举出来。也许还有更重要的，因为我不知道，没有能够举出来。列举现象毕竟是一件比较简单、比较初步的工作。不只发现这些现象的发展规律是一系列的复杂的工作，而研究一个史学家的思想和著作，具体地分析其精华和糟粕，也要遇到复杂得多的情况。

在中世纪每一个史学家的历史思想上，总是有精华的一面，也有糟粕的一面。司马迁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这是精华的一面。但他相信循环说，这是糟粕的一面。因为他反封建专制主义是主要的方面、是突出

的方面，他相信的循环说在《史记》里并不占重要的地位，因此他是一位进步的史学家，但也因此我们也不应该看不见他的糟粕的方面。刘知几反对阴阳五行的神秘的迷信，但有时又不敢彻底否定，反表示一种存而不论的阙疑态度。他揭露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普遍存在的残酷斗争，但又眷恋于士族的社会荣誉。刘知几思想中的精华和糟粕，又不同于司马迁，而是在同一问题上有这一个方面，又有那一个方面。但也因为积极方面是主要的，他同样是一个进步的史学家。

史学史上也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学者在历史思想上是不可取的，而在历史编纂学上和史料学上有他的长处。司马光的政治历史和历史观点代表当时反动大地主的立场，《资治通鉴》是贯彻了这样的立场和观点的。但司马光为了提供有用的“资治”的材料，他的编纂工作是进行得认真的。他作了满两个屋子的长编，又作了说明材料取舍的《考异》，又作了详略不同的提挈纲领的《通鉴举要历》、《通鉴目录》和《历年图》。他又能集刘恕、范祖禹等人的专长，在他的主持下，修成一部首尾贯通的二百九十四卷的巨著。他的编纂方法和经验，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阎若璩、毛大可之流曲学媚世，这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但他们的考据成果和考据方法，如果有可以吸取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在某一点上加以肯定。例如《古文尚书疏证》这部书，在解决《尚书》古文真伪的问题

上，也还是对于我们有用的书。

史学遗产中的精华和糟粕，经常是糅杂在一起的。在很多的情况下，这种糅杂是泾渭分明，可以一目了然的。在很多别的情况下，或是红紫乱朱，或是沙里藏金，这就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应该说，史学遗产中的糟粕，是很多的。我们说弃其糟粕，是说在遗产的继承上要丢掉糟粕，也并不排斥对于糟粕的利用。章学诚说：“古之糟粕可以为今之精华，非贵糟粕而直以为精华也；因糟粕之存而可以想见精华之所出也。”这句话说得有道理。精华和糟粕是相对的。把两者对比，就可以看出精华和糟粕来了。没有糟粕，也就无所谓精华了。同时，糟粕和精华，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研究中国史学发展过程的工作中，善于分析糟粕和精华在各方面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现实意义。

## 要百花齐放

解放以来，我们史学领域里开了不少的花，也有不少是含苞待放，不少是蓓蕾初成。如何东风齐着力，使史苑里万紫千红，这是我们史学工作者必须坚决在党的领导下早日实现的责任和光荣。我们要在整个史学领域内百花齐放，也要在这一领域的不同园地里百花齐放。对于史学遗产的研究工作，同样需要百

花齐放。

对史学基本观点遗产的研究应该是第一个花圃，这里可以有三种花。第一种是对历史观的研究。上文所说的思想内容，无论哪一家哪一派都属于历史观本身的范畴，这里不再多说了。分析批判各种不同的历史观，这是我们研究史学遗产时首先要担当起来的重要的工作。当然，过去无论哪一种历史观都不可能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相比。但分析批判这形形色色的历史观，对于掌握历史理论的发展规律，锻炼我们的识别能力，丰富我们的理论，提高我们的水平，都是不可少的。

第二种花是对于历史观点在史学中的地位的研究。对于历史观点的注意，在中国史学史上是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孟子·离娄篇》：“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义，就是观点。范晔自序，强调观点对史文的作用，说：“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他感慨于因识见之不同，而论议不能相投，说：“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故也。”刘知几以才学识为史家必备的三长，有类似于今人所说的文史哲的关系，而特别注意于“通识”的重要。章学诚继承刘知几而加以发展，在《文史通义·说林》篇中申论“志识”在史学工作中的作用，如说：“文辞犹品

物也，志识其工师也。橙橘 楂梅，庖人得之，选甘脆以供筮实也。医师取之，备药毒以疗疾疚也。知此义者，可以同文异取，同取异用，而不滞其迹者矣。”又说：“文辞犹金石也，志识其炉锤也。神奇可化臭腐，臭腐可化神奇。知此义者，可以不执一成之说矣。”这对于观点驾驭史料的作用，说得是很中肯的。其他史学家有不少谈到这类问题的，在他们中间也有不同的意见。这是可以一一分析，给以批判地总结的。

第三种花是对史学工作的作用的研究。《易·大畜象辞》：“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这是一种看法。所谓“德”，当然有它的具体内容。《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春秋之称……善人劝焉，淫人惧焉”。荀悦《汉纪》有五志：“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袁宏《后汉纪》，要“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一直到后来，朱熹编《通鉴纲目》，是要以史书作为封建伦理教科书。像这一类的看法，都可说是跟《易·象辞》的看法是基本一致，而又各不相同、各有其特点的。

旧史家艳称春秋时期晋董狐和齐太史的直笔，不顾性命的危险，要按照史法办事。这实际上也反映对历史书的一种看法。这跟孟子所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同样的观点，是以史笔作维护既有统治秩序的工具，而跟实事求是的直书有所不同。